

古典瞬間

■龔敏迪

上海博物館早期書藝欣賞

早期的甲骨文、金文書法，字與字的大小不一，結構組合也不固定，也還不能算是方塊字。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它們的會意，這反而讓人覺得更具有錯落有致的欣賞價值。從甲骨文線條刻寫的纖細規整，和金文鑄造的認真勁上，特別讓人感受到一種對於天意神明乃至文字本身的虔誠敬重之心。上海博物館書法館展出的「保卣」，上面的金文是周成王時期以秦為代表的「西土金文」，和青銅器中屬於「東土金文」的吳王光之劍上的鳥蟲書還是吳王夫差盃的銘文，一個是遒勁凝重，一個是纖雅靈動，表現出了不同的地域的個性風格。繼金文之後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說：「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。」而現存的石鼓文的大篆，考證認為：是秦穆公時代的作品。儘管吳王夫差盃的銘文也已經是長方形的，但人們仍然將奠定漢字為方塊字之功，記在石鼓文名下。而楚人李斯在大篆的基礎上把文字統一成的小篆，也不難看出東土西土風格的某些融合。規範與突破伴隨著漢字演化的整個過程，它讓人感受到歷史脈搏的跳動。

人們總是難以忘懷追求個性表達的結果是：繼篆書之後的漢隸，出現了被郭宗昌譽為漢隸第一的《漢魯相韓造造孔廟禮器碑》，其書法藝術的妙處正如楊守敬所說：「寓奇險於平正，寓疏秀於嚴整，所以難也。」一筆一劃之間，能夠如此層出變化，往往在看似平凡中顯示出人意表的不平凡，總是能讓人觀賞者得到某些觸動和啟示。上海博物館的這一早期拓本，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這個特色。

漢隸演變到魏晉時期行書以後，就有了更豐富多彩的發展。一方面是門閥世家在追求養尊處優中，或是越來越變得殘暴，或是愈來愈變得庸俗無能；一方面是士人在高壓下愈來愈失去了政治的熱情，於是「樂琴書以消憂」，不少人傾一生精力於藝術，以表現自我的存在，使書法藝術也上升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巔峰，其代表人物則非王羲之莫屬。繼永和九年寫下《蘭亭序》以後，王謝門閥中人的王羲之於永和十一年三月他稱病棄官，由會稽山陰徙居金庭。建書樓，植桑果，教子弟，賦詩文，作書畫，以放鶴釣魚為娛。他一變漢魏以來筆法，獨創出一種圓轉流利的風格。

《大唐三藏聖教序碑》就是長安永福寺懷仁，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遺墨中，花了二十四、五年的時間集字而成的，這裡的宋拓本就比較完整地展現了王羲之的藝術成就。王羲之終於對人們不斷的表現個性追求做出了一個總結。以王羲之為分水嶺的書法藝術，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，書家們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個性表現的多種追求和展示，它也預示了這輪新的融匯與突破，將會更加多姿多彩地表現出人們不懈追求的精神，乃至不同人物靈魂的掙扎的痕跡。



元入門，也很若驚，一口氣應承下來，給李夢陽說了話，果然一語勝萬句，李夢陽沒事了，出獄了，李夢陽後來官還當得很大。

李夢陽官當大了，大到可以一頂一萬句了，據說他說得上話了，卻是不太說一句話了。後來劉瑾倒台，康海難脫干係，他與劉瑾是老鄉嘛，實際上也上過劉瑾家門嘛。許多人，據說包括李夢陽沒說康海N次得機會卻沒上劉瑾家門，單說了那次上了劉瑾內屋，也沒說那是出自「對山救我」之因果緣由。康海於是列入劉瑾窩案，削職為民，其時是36歲。其實，康老師鄉居日子過得很不錯：「家居不離聲妓，管弦、絲竹一飯必用。」一日三餐都是：「酒必妓，妓必歌，歌必自製。」最浪漫的一次是其過生，喊了百名藝妓來家唱歌跳舞，名百妓宴，爽心得不得了。只是筵席散後，康海回想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的京都歲月，到底意難平，康老師也就編了一劇，叫《中山狼》，對空罵一句：子係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聊以解解氣。

康海狀元即落到這個境地，時人說這源自康老師當編輯那當口，殺文字過多而作的孽。康老師當編輯老師，愛刪稿子，對青年新進之士刪了也就刪了，刪得切齒略略響，也沒多大的事；來事的是，這些新進之士，假借國士文，來讓康海下刀，「故同進者忌，偽以國老文就而正之」，康老師也是「海不疑，筆削而授之，十存一二焉」，這就變成禍了，「實禍之也」。明朝那時節，士優則仕，知識分子將話語權與執法權集與一身，康老師殺了其面子，他哪裡肯？「故諸老鹹病海」，康海也就「遭內艱而歸也」。

就因當編輯，愛刪官人兼文人之文章就遭落井下石之禍？就遭開除官職？我覺得不太可能，我在茶館與一位哥們聊康海事，說這不可能。哥們說，沒有甚麼不可能的，文人心胸狹窄些，這是真的吧；何況搞海海路子的，士士合一，政教合一，康海顯能愛做文字刀斧手，士者之仕爭當他人命運之刀斧手，也就一切皆有可能了。

歷史空間

康海慣做文字刀斧手

■劉誠龍

曾喝了一個文學小酒，席間王躍文先生說起了一件軼事，王先生大作成，交了北方一位美眉編輯，編輯甚熱情，一字增一字刪，甚是仔細，王先生文中有一句話是：文人都喜歡花半開酒微醺的。許是美眉編輯好意，擬多開分毫稿費，對王先生此句不刪，反增字數，在這短句三個名詞下面都添了一個兒字，變為：文人兒都喜歡花兒半開酒兒微醺。美眉認真，將修改稿轉王先生審定，王先生給改了去，變為：文人爹都喜歡花爹半開酒爹微醺。美眉編輯打電話來說：王老師，您錯了，應該是兒；王先生壓着火氣回她：兒兒兒，兒你個爹。北方人說話，愛捲舌，很喜歡兒化韻的，湖南人，吃辣椒的，只是吐舌，不捲舌。王先生說了這軼事，《文學界》主編、《烏龍山剿匪記》的編劇水運憲先生接過話頭，也說了一件開眉鎖的事，說他有個同學，在北大當教授的，給他寄來一部長稿，水先生交給一位編輯給編輯編輯，這老兄手勁大，斧頭論得虎虎生風，去頭去勢，十留一二，返回給作者過目，作者見了大惑，打電話給水先生：我馬上飛機過來，請你組織權威人士開論證會，若是編者改得有道理，所有費用我獨包，若沒道理，我的鞍馬費專家小意思場地租賃等一干開支你給全承擔。水老說這故事沒落腔，旁邊窺出一句話來：最好的編輯是只會改錯別字的。我猛回頭，看到發出這話的是一位作者。

作者與編者真是一對歡喜冤家，作者文成，口聲聲呈貢編者斧正；編者接過，嘩嘩嘩猛削刀斧，編者這頭快意，作者那頭喊痛了。

明朝大家康海，也曾當過翰林院編撰，算是編輯角色，康老師手猛刀快，是編輯中的李逵，作者紙上排兵佈陣，搞字海戰術，一行行一頁頁，文字密麻麻站列，康老師見了，掄起板斧，排排砍；作者一片心血，血染紙背，當然哎呦哎呦喊痛，只是莫奈其何。作者在文學女青面前，是強勢，到了編輯老手那裡，地位直轉陡降為弱勢群體了，編輯掌握着對文字生殺予奪的話語權，作者有甚申訴的？只是盼望編者，揀殺子處下刀，脖子較細，割起來沒那麼痛。「在史館凡三年，凡論者必宗經而子史，以宋人言為俚，以唐為巧，以秦漢為伯仲而

有駁焉。」新進之士投稿給康老師之前，誇說自己文章是標新立異二月花的，到了康老師手上，刪，刪，刪，只剩幾個光杆杆，心裡泛酸甚，嘴裡還得高頌康老師刪繁就簡三秋樹。康老師太愛刪文章了，人家來稿2000字，他要刪為1500字；人家來稿1500字，他要刪成1000字；人家來稿1000字，他要刪為500字；人家來稿500字，他要刪為0字；刪得這麼徹底了，人家不來稿了，康老師在那裡喊：怎麼啦？不來稿了？康老師那握刀的手，沒啥可割了，也開得發慌，要喊人送脖子來。

看到康老師喜歡如此下刀，名氣不彰的作家也就設局，找來當朝國家一級作家李東陽等大師的稿子，拿來叫康老師斧正斧正，康老師熱情倒是十分熱情，客氣卻一分也不客氣，操起筆斧，一路砍，一路削，一頁一頁，從天頭打叉到地角，「故同進者忌，偽以國老文就而正之，實禍之也。海不疑，筆削而授之，十存一二焉。」

康老師殺氣騰騰，源自其才氣縱橫。康海參加國考，頭次沒中狀元，很不服氣，寧可複讀，也不願單列孫山前；再次殿試，果然獨佔鰲頭，考官劉健閱其卷，高打評語：「詞意高古，嫻於政理。不惟三百人不及，自有制策以來，鮮見其比。」皇上看了，也高興，「大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，是可以變今追古矣！」聖心大悅，擢為第一，有好事者統計歷史，陝西狀元第一人，不是別人，恰是康海。康老師作文，都是一揮而就，若翻新發：「凡撰著」那文字「滔滔乎來矣，夫然後操觚而揮」；文章高義，新意迭出，「蓋養其鋒而善用之，恒若新發錐也。」

才氣那麼高，性情狂些，看起文章來，眼界高些，這是必然的事。可愛的是，康老師為文狂，為人卻是蠻好的。首先是講政治，講正氣。康老師有個老鄉，其人下頭一點都不硬，上頭卻是硬得不得了，其時權力熏天，炙手可熱絕倫，這人很著名，叫劉瑾，因是老鄉，陝西老鄉合謀以劉瑾當會長，在京都立個山頭，想着來拉康海，謝還設了飯局，「一日置酒厚請，見客座皆邪媚者。」康老師到了，聽說會長是劉瑾：「此為排謝招我也？」當即拂袖，擲下狠話走人，「遂正言責之，座客皆愧服。」其次是講情誼，講義氣。國家一級大師李東陽被劉瑾所陷，下了獄，性命繫乎一說話，當然這話，不是我的話，也非你的話，你我萬句當不了劉瑾一句話。誰能讓劉瑾給句話呢？獄中李夢陽想起了康老師，於是暗寫了紙條：「對山救我」，傳遞出去，對山即康海。康海見了血字書，心理鬥爭得厲害，主要是義氣與氣節自相鬥爭，救國士者，關義氣也；找劉瑾者，關氣節也；康老師總是朋友義氣勝了個人氣節；拉了老臉與名士臉，去了劉瑾家。劉瑾見康狀

豆棚閒話

■李恩柱

偶然發現

再嚴密的監察制度，也有作用消滅的時候。譬如，清朝的監察制度是比較細密的，然而好多多大案要案露出醜惡面目來，則與監督機構沒有甚麼關係。最明顯的是王亶望案。

王亶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，並不是各路禦史奏報、彈劾的結果，而是與阿桂、和珅在甘肅評定蘇四十三作亂有關。

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三月，甘肅河州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回民起義。經過幾次交戰，官兵損兵敗北不能連勝。乾隆很生氣，撤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職。時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，主動向乾隆上奏，說現在正是用兵之際，軍費緊張，自己樂意把平時積攢的四萬兩廉俸銀貢獻出來，「以資兵餉」。乾隆皇帝見王廷贊一出手就是四萬兩銀子，覺得奇怪：僅僅一個藩司，家計怎麼那麼充裕？是不是和捐監有關？

清代的藩司(布政使)是總督、巡撫的輔助官員，俸銀、養廉銀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一萬兩。尤其甘肅，偏遠貧瘠，「官場素稱清苦」，所得與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。甘肅的布政使養廉銀為每年7000兩白銀；俸銀不分地域，全國標準一樣。布政使是從二品官員，每年也就是白銀155兩。因此說，王廷贊無論如何也捐不出四萬兩私銀。

於是，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，乾隆皇帝傳諭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，嚴密訪查王廷贊，看他是否染指捐監一事。當時，蘇四十三起義這個事件還沒有得到控制。乾隆並未因有軍事行動，就擱置調查甘肅的貪污案。

甚麼是「捐監」？曾經積弊甚重的「捐監」，甘肅為何又得重開？所謂「捐監」，就是允許一些有錢有糧的人通過捐糧換取「監生」資格，並可以應試入官，稱「監糧」。捐交的穀糧，遇到災荒即用來賑濟災民。七年前，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，當時的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請，甘肅地瘠民貧，需要在轄區內實行捐糧為監。乾隆同意了勒爾謹的意見，並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肅主持捐監。王亶望在乾隆眼裡屬於「能臣」，有在甘肅工作的經歷，做過知縣、知府，這次到甘肅做布政使，屬於平級調動。王亶望到任後，向總督勒爾謹建議各州縣都可以收捐，這樣可以解決內地糧倉儲備不足問題。

乾隆三十九年十月，王亶望赴任已經半年

了，他向乾隆帝匯報了甘肅省的「捐納」情況：到九月底止，已有19,017餘人前來捐納，共收得糧食827,500餘石。乾隆皇帝肯定了王亶望工作成績，說他「承辦認真」；除此他還有幾個疑問，勒爾謹自圓其說地解答了，沒有露出破綻，乾隆也就相信了。實際上，王亶望所謂的八十多萬石糧食只是個虛數，糧倉裡一粒也沒有。不久，勒爾謹又上奏，稱甘肅省雨水稀少，連年大旱，需要大量的糧食賑濟百姓，希望皇帝准許把糧食折成銀兩。

經過精心謀劃，王亶望們將皇帝只准捐糧的規定做了改動，原來四十石糧授一名國子監生，改為收取銀兩後，授一名國子監生則變為五十五兩白銀。如此這般，甘肅這個不富裕的省份，就成了那裡官員的「富貴鄉」，民間的捐銀巧妙地變成了私有財產，自總督以下都有份，自然王亶望得銀最多。最後，甘肅全省各級官員一百餘人，「上下勾通一氣」，毫無忌憚侵吞國帑民膏。

由於捐監有功，乾隆四十二年五月，王亶望陞遷為浙江巡撫，由王廷贊接任布政使一職。王廷贊「知其弊，不能革」；甘肅一如從前，集體貪贓枉法。不能說這一系列欺騙朝廷的措施，是總督勒爾謹的原意，但作為總督不僅默認布政使的貪污行為，而且為其提供方便，負有嚴重的領導責任。勒爾謹的結局頗為引人思考：乾隆沒有讓他異地為官，或有名無實地避避風頭，而是迫令他自殺。這是案件暴露後的一些話，不必多提。

實際說來，甘肅貪污大案的查處，並非單純因為王廷贊捐銀四萬兩一事。那件事不過提醒皇帝，甘肅捐監可能有問題。實際上，原任布政使王亶望的奢靡生活，乾隆一直印象深刻，也常有所思，但沒有證據。真正使這件「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」啟動大範圍調查程序的，是大學士阿桂與尚書和珅初入甘肅時的報告。和珅奏摺入境即遇雨，阿桂也報告軍隊經常遇雨，道路泥濘，難以速進。「雨」字，使乾隆的懷疑之情有了湧動的突破口，因為甘肅省的報告向來稱少雨大旱，需要賑濟。《清實錄》曰，乾隆看了阿桂他們的報告很感慨，「可見該省亦並非竟少雨澤，人言俱未足信」。傳諭阿桂、李侍堯確切訪察。阿桂、李侍堯奏報了王亶望等令監糧收輸銀及虛銷賑粟自肥各種情況，甘肅的彌天大案才揭開了序幕。乾隆表

亦有可聞

伴君易得咎

■青絲

古語云：伴君如伴虎。意指人仕做官，隨侍君王之側，就像與虎為伴，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。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帝王性情往往多疑粗暴，喜怒陰晴不定，難以揣摸，做臣子的稍不注意就會犯過，由此遭到罪責。清代是等級制度劃分得最為細緻的時期，各階層等級的人物都要嚴格遵守禮儀制度行事。尤其是朝臣，經常要面見皇帝，上奏摺對，若在某些小細節上有所疏失，就會惹出事端，嚴重的，甚至會引來殺身之禍。

清初的時候，康熙某日心血來潮，要親自主試武進士的騎射，遂率領朝中大臣一同前往監考。戶部尚書趙申喬年老力衰，監考過程中，靠在座位上不知不覺就睡着了。座中同列認為他犯有失儀之罪，遂當面奏劾，要求康熙重重處罰。好在趙申喬在地方任職多年，素有清官的名聲，康熙對他頗有好感，不願為了一點小事罷免他，於是網開一面，不加譴責。此事後

乾隆年間，隸漢軍旗副都統明泰，隨上司榮格郡王綿德入宮覲見皇帝。明泰之前駐防寧夏，因積累軍功陞遷，是個心性粗疏而不注意小節的武人。綿德是乾隆的親孫子，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，在覲見皇帝的諸大臣當中府階最高，所以第一個入殿。明泰不懂規矩，見上司進去，便緊跟在後頭。乾隆給親見的一品官賜坐，眾大臣磕頭謝恩後便坐了下來，明泰也叩坐

一再堅持。雍正惱怒，把手中的筆丟到孫嘉澍的筆筒裏。孫嘉澍也沒多想，撿起雍正丟下的筆，「孫嘉澍這才醒悟闖下了大禍，馬上捧筆頭謝罪。雍正卻不依不饒，下令侍衛把孫嘉澍五花大綁地拉到獄中關押，準備擇日處斬。後來才免了孫嘉澍一死，但把他貶到戶部銀庫，做一個專職看守的小吏。」

如儀。乾隆見他一個二品官，也敢坐位子，頓然詫異。經人提醒，明泰才知道自己逾禮，趕緊脫帽下跪謝罪。第二天，他就被貶為庶民。咸豐朝紅極一時的權臣顧順，有一次在宮裡看戲，咸豐因有事先行離開，顧順想也不想就坐到咸豐的座位上繼續看戲。後來，兩宮太后及恭親王奕訢發動「辛酉政變」，這項「擅坐御位」的罪名，也成為了處死顧順的一大罪狀。顧順最終為自己的專橫跋扈、不拘小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。對於皇帝來說，只要有需要，再忠直的臣子也不過是過客，是浮雲，只有江山才是永恒的。



孫嘉澍 網上圖片



態：「案內各犯，俱屬法無可貸。」王亶望處斬刑，王廷贊處絞刑，勒爾謹賜死；貪污數萬兩的巨犯斬首56人，免死發遣46人，革職、杖流、病故、畏罪自殺數十人。

以「醜聞」論，嚴厲的清王朝竟有這樣的黑幕，對乾隆未必有利；可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說，乾隆皇帝此舉不僅維護了統治，也使人認識到他的睿智和聰明。這比把醜惡遮蓋起來不讓人知道，強了不是一點半點。可惜後來這位皇帝處理貪污案時態度不再這樣堅決。

此案留給後人的疑問也不少。比如，嚴密的監督制度為甚麼對此案沒有任何監督？所謂監督，對高官能起作用嗎？這不僅涉及到監督的地位，也與如何設置監督一職有關。

在清代，總督、巡撫等封疆大吏，是地方最高長官，兼掌地方監督，擁有彈劾、考察、薦舉、罷免官吏的權力。地方監察官員則為其屬吏，命運與督撫息息相關，自然心存顧慮，不敢彈劾。這就使監督陷於尷尬的境地：位高權重的督撫，本身是應該受到監督，但他們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，難以受到監察機關的有效監督，使監督變得徒有虛名。譬如，雍正皇帝時，河南巡撫田文鏡深得聖上寵信，禦史謝濟世彈劾田文鏡不法，世宗看了奏摺很不高興，「擲還其疏」。乾隆初年，江蘇按察使陳宏謀彈劾巡撫金鉉「欺公累民，自開捐報墾不下二十餘萬畝，實未墾成一畝」。結果朝廷不但未處罰金鉉，反而將陳宏謀降級調用。

監督不了，實質原因在於專制體制，之後才是監督制度設置的缺漏。如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，為禦史錢澧參劾，國泰罵錢澧曰：「汝何物，敢劾我耶？」國泰的囂張，初看來自於「朝裡有人」，其實得自於他的用人權力。專制社會用人誰，提拔誰，都是統治者一個人說了算，毫不公開，好不透明，宋朝以後尤其如此。這樣環境，監督也只能成為具文，難以真正實行。一些案件，只有貪污集團內訌才會偶然由內部人揭發出來，不然就像乾隆發現甘肅大案一樣，無意之中捉得大魚。(識貪·十五)